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六三期 ——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1b)

【历史一页】“文革”中风靡一时的毛泽东诗词版本	陈安吉
【往事回首】关于文革邮票的探讨	狄超英
【各抒己见】林案再思考	W u r e n
【知情者说】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叶永烈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历史一页】

“文革”中风靡一时的毛泽东诗词版本

• 陈安吉 •

“文革”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在这十年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有许多不同于别的时期的特点。了解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及其演变过程，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诗词传播的历史发展状况，而且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文革”期间的社会思潮及其变化情况。

◇ 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集充分反映了“文革”时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版本种类多。“文革”以前，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的任务。这两家单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的版本种类有限得很。“文革”期间，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以外，人民出版社，军队系统的出版社，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版社，都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更有甚者，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也自行编印出版了不少毛泽东诗词集（这类出版物中绝大多数是注释本、解说本）。以上这些毛泽东诗词集所收入的诗词多数

是“文革”前即已正式发表的37首（1976年1月，又新发表两首词），但文字却稍有出入，版式、封面、字体、开本、纸质更是多种多样。“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多得不可胜数。

其次是印刷数量大。“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毛泽东的诗词同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一样，被当成了“最高指示”，大量印行。据1967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单是1967年一年内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就达5700多万册。这个数字约相当于“文革”爆发前8年内（1958年至196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总印数的10倍。但这还只是国家正规出版社的统计数，若加上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印刷的，那数字就更大了。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印行数量之大，在毛泽东诗词的出版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再次是装帧设计体现“文革”意识。“文革”之前，毛泽东诗词集的装帧、版式一般都具有我国传统图书古朴、典雅的形式美。这种装帧形式，自1966年9月以后至1974年3月的七年半里，被弃之不用。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诗词集只印横排本、平装本、简化字本，不印竖排本、线装本、繁体字本；封面颜色一般都采用象征革命、象征阶级斗争的红色，不装饰花纹，如同毛泽东语录本（通称“红宝书”）一样；中央级专业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一般都在诗词前面印有毛泽东标准像，有的集子还在扉页上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这些都同毛泽东著作一样，意味着毛泽东诗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人人必须加以掌握、运用的“最高指示”；开本一般都较小，64开、100开，甚至128开，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工农兵随身携带、随时学习。这样的装帧风格，直到“文革”后期才有所改变。1974年3月，曾经一度恢复出版了几种“文革”前的古典装帧样式的毛泽东诗词集，但印数不大，在当时的“批林批孔”以及紧接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中，大众传媒对这种装帧的版本未作任何报道。

虽然“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种类繁多，但就诗词文本的内容和体现“文革”特征的装帧形式来说，仍然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等几家单位的毛泽东诗词集，最具社会影响。

◇ 每册0.08元的价格，便利了毛泽东诗词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196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毛主席诗词》版本，同1963年12月两家单位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一样，都是37首。从所收入的诗词内容来说，这一版本是“1963年版”的重印本；但从装帧、版式、字体来说，从个别文字、标点的变化来说，却是一个新版本。1966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中左部位刊登了“1966年版”的出版消息：

让伟大领袖的光辉诗篇更普遍地同革命群众见面
《毛主席诗词》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出版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毛主席诗词》（37首）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将于国庆节前后陆续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普遍发行。文物出版社还影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单页，也将在国庆节前后陆续向全国各地发行。

毛主席诗词是毛主席光辉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亿万革命群众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迫切希望得到《毛主席诗词》。几年来，虽然出版了好几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但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工农兵读者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出版能够随身携带、便于工农兵阅读的简体字横排袖珍本《毛主席诗词》。出版社和印刷厂的革命职工为了满足革命群众

的要求，争取在国庆节前出书，他们争分夺秒，日夜赶印，充分发挥了革命干劲。

从这一则消息可知，出版新版《毛主席诗词》的目的，是想通过版本变化让毛泽东诗词更普遍地同工农兵群众见面。“1966年版”与以往的毛泽东诗词集比较，在版本形式上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开本小，为64开袖珍本。自1958年出版第一本毛泽东诗词集以来，“1966年版”的开本比以往任何一种毛泽东诗词集的开本都小。

二是横排本。在此之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都是竖排本。

三是简化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曾采用简化字。从1963年12月开始，其后的几年里，不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都是繁体字。“1966年版”（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的版本）改成使用简化字。随之，《卜算子·咏梅》中的“咏”字从“言永”改为“咏”。

四是封面为红色。“文革”以前的毛泽东诗词集，封面不用红色，图案素雅。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的封面全部是红色，上方是白字书名，下方是深红色的毛泽东手迹《清平乐·六盘山》；文物出版社“1966年版”的封面，上半截为红色，有两行黑字书名，下半截为白色，印有红色五角星。

五是书前印有毛泽东棕色标准像一幅，如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一样。这一点，也与“文革”以前的毛泽东诗词集不同。

由于“1966年版”的开本小，装帧较简单，且印量大，因而印制成本较低，价格便宜（每册0.08元）。这样一来，的确便利了毛泽东诗词走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

前面说过，“1966年版”所收入的毛泽东诗词，同“1963年版”一样。诗词文字及标点依从“1966年版”上海第六次印刷本（1966年5月出版），但是有两处进行了改动：一是变动了《水调歌头·游泳》的一个标点，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二是变动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一个字，将“薜荔”改为“薜荔”。这两处改动，是毛泽东接受了胡乔木1966年4月一封信中提出的建议而形成的。“1966年版”的诗词内容，包括文字及标点，在后来的9年时间里（至1975年12月止）基本上没有变动。

“1966年版”印刷发行数量很大。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几乎都有重印本，仅上海一地就印刷了6次；文物出版社的初版即印110万册，1967年3月又再版（再版时封面设计有所变化）。两家出版社在8个月内总印数逾千万册。

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文物出版社在1966年9月出版过一种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一版本的诗词内容，与同时出版的平装本一样，但装帧却与“1963年版”的线装本相同，只是字体不再是集纳宋浙本《攻女鬼先生文集》的字影印，而是改为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这个线装本是“文革”之前准备就绪的。1966年9月出版以后，直至1974年3月的七年多时间里没有重印过。

196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出版了新的《毛主席诗词》。“1967年版”在内容上是“1966年版”的重印本，

在装帧设计上也与“1966年版”大体相同。但是，“1967年版”与“1966年版”仍有一些不同之处。“1967年版”文字上有一处改动，即《蝶恋花·答李淑一》的“编者注”改动了一个月份，将注文中的“一九五七年一月”改为“一九五七年二月”。“1967年版”在装帧上也有几点变化：一是开本更小，100开；二是不再用纸质封面，而是改用红色塑料封套；三是封套上的书名“毛主席诗词”五个字烫金，封套上的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词是塑料凸版字。这种装帧设计，使得毛泽东诗词集从形式上更加类似于风行一时的“红宝书”。

1967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都用很大的篇幅，刊载了新华社编发的毛泽东三本文艺论著重新出版的消息。该消息将重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论文艺》称为“三本革命宝书”，说它们的出版“给战斗在第一线的文艺战士和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武器”。1967年一年总共印《毛主席诗词》5700万册，其中相当大的数量是当年5月开始出版的“1967年版”。

“1967年版”于1968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又有两点变化：一是把红色塑料封套上的毛泽东手迹更换了，原来拼接的那幅《清平乐·六盘山》手迹，换成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二是改变了《卜算子·咏梅》后面附的“陆游原词”独占一页的状况，将“陆游原词”移至《卜算子·咏梅》后面的空白处，总页数从58页变为57页。

“1967年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各种毛泽东诗词集的蓝本。

1976年1月，两首新词发表后，《毛主席诗词》增加到39首

“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装帧设计上与“文革”初期、中期的毛泽东诗词集有所不同。

197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线装大字本、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等四种不同的装帧，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从装帧形式看，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的“1963年版”的样式：竖排、繁体字（《卜算子·咏梅》的“咏”字又恢复为“言永”字），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的开本为特30开。装帧设计上与“1963年版”不同的是，布面精装本的布面用红色，书名烫金，未用郭沫若题字，扉页如同《毛泽东选集》那样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这说明，“1974年版”仍然具有“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版本的部分特征。“1974年版”所收诗词，与“1963年版”完全相同，只是文字、标点依从“1967年版”。正因为“1974年版”与“1963年版”大同小异，故“1974年版”在版权页上清楚地标明，它是“1963年版”的第二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中的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于1974年6月第二次印刷，精装本由布面改为纸面。

1974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大开本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字体是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这是文物出版社1966年9月版线装本的重印本，只是开本大一些，诗词的文字、标点依从“1967年版”。1975年6月，文物出版社按照1974年12月的这个版本出版了小字线装本。

1974年出现类似“文革”前装帧形式的毛泽东诗词集，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后，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对“九一三”事件以及“文革”以来的一些极“左”做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周恩来在1972年的八九月间

作了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1973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同年12月，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次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同意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采取某些措施纠正文化、出版领域里部分极“左”的做法。“1974年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文革”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曾得到毛泽东的喜爱，因而重新出版这种装帧的诗词集既不会引起毛泽东的反感，也不易给反对这种装帧形式的人以口实。可是，“1974年版”问世的时候，正当“批林批孔”的声浪滚滚。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声又紧。因此，“1974年版”没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纸上刊登出版消息。

1976年元旦出版的《诗刊》，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同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词二首》的单行本。该册子除了收录毛泽东的这两首新词外，还收录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文。不久，几乎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版社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出版了《毛主席词二首》的单行本。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词二首》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毛主席诗词》的新版本（以下简称“1976年版”）。这个版本与以往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上述两首新词，使其所收录的诗词达到了39首。197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右上方的显著位置，用花边围框刊载了新版本的出版消息，全文如下：

《毛主席诗词》新版本出版

新华社一月十九日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公开发表后，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切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这二首新词与原出版的毛主席三十七首诗词合编在一起，共三十九首，出版了毛主席诗词的新版本。由新华书店在全国陆续发行。《毛主席诗词》新版本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一毛泽东诗词集新版本，所收录的两首新词是据《诗刊》1976年1月号，所收录的原37首诗词的文本同“1974年版”。开本与“1963年版”、“1974年版”相同，特30开。版式由“1974年版”的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这一新版本于1976年7月第二次印刷（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1976年5月出版了一种含39首诗词的线装小字本《毛主席诗词》。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新版本的同一个月，文物出版社也出版了两种不同开本的繁体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字体都是集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影印。其中一种大开本的朱砂本，是供出口用的。

◇ 军队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

“文革”中，军队广泛地介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因此，这一时期军队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产生了较大影响。

笔者见到的“文革”初期军队某些大单位的政治部门在内部印行的《毛主席诗词》有：1967年8月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1967年12月总参谋部政治部印本、1967年12月海军政治部印本、1967年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等。这些印本一般为64开（个别为100开），均有红色塑料封套，收录毛泽东诗词37首，文本均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

67年版”相同。这些印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诗词前面有若干幅印制精良的毛泽东照片，并且有毛泽东诗词手迹若干幅。

1968年10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包括毛泽东诗词37首在内的《最高指示》。这是一本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的合集，100开，红色塑料封套。《毛主席诗词》这一部分，收录毛泽东诗词37首，文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相同。受军队出版的这本“三合一”的影响，人民出版社于1969年2月出版了128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人民出版社将该书的纸型发到全国各地，在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印刷发行。解放军战士出版社于1969年3月再一次出版《最高指示》一书，128开本，除编入了1968年10月版的三部分内容外，还增加了《最新最高指示》部分，收录“文革”以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言论。

1970年，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100开，红色塑料封套。收录毛泽东诗词37首，文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相同。

1976年1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30开，53页，封面印有梅花纹理。本书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翻印的，收录毛泽东诗词39首。

◇ 毛泽东传抄诗的流传，是“文革”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

文物出版社1965年开始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手迹，都是小型单页。“文革”期间，文物出版社和几家书画、美术出版社，以单页或裱装形式出版了毛泽东的一些诗词手迹。文物出版社和上海的书画社还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手迹的汇编本。这里对几种主要的手迹本介绍如下：

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手迹本的时间最早，版次、印次也较多。该出版社1967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32开，分道林纸本、新闻纸本两种，收录毛泽东下列10首诗词手迹（是墨迹，而非手稿）：《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水调歌头·游泳》、《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些手迹都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忠实于毛泽东的原作。诗词手迹所附楷体正文，是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9月版的《毛主席诗词》排印的。1969年9月，《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再版重印。

1971年9月，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道林纸本，10开，红色压膜护封。本书收录毛泽东15首诗词的手迹（是墨迹，而非手稿）。15首诗词中有10首与1967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所收入的相同，新增加的5首是：《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蝶恋花·答李淑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5首诗词的手迹此前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过单页。

1973年5月，上海书画社出版了新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分道林纸本、新闻纸本两种，均为32开。封面为白色，上着梅花纹理，书名烫金。收入的诗词手迹，与1971年9月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出版的同名书所收入的相同。1975年11月，上海书画社又出版了大开本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收录上述毛泽东诗词手迹15幅。

文物出版社于197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0周年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墨迹》，特大开本（相当于6开）的线装本，收录毛泽东15首诗词的手迹，与上海东方红书画社1971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相同。

“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和毛泽东诗词注释本，都曾编入过一些毛泽东诗词手迹。这些手迹，有几幅是拼接的（横式改竖式），其中还有几幅是赝品。

从上述版本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文革”期间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一直没有收入过传抄的毛泽东诗词。但各地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毛泽东诗词集或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讲解本，出现过传抄的毛泽东诗词。这种情况发生在1967年8月之前，主要出现在1966年和1967年之交。1967年8月之后，这种现象几乎绝迹。这些传抄诗中，有少数几首后来经过证实确实是毛泽东所写。如《西江月·秋收起义》，是谢觉哉在1956年《中学生》杂志上披露的。另外还有《读报诗》（三首）、《八连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文革”前，这些诗词曾在小范围内印发过，因而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得到流传。也许是在“文革”初被红卫兵抄家而流传到社会上。这几首诗词经过辗转传抄，大多有漏字、误字、衍字。传抄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是毛泽东1965年9月的清样稿，与1976年1月发表的有些不同。传抄诗词中的绝大部分不是毛泽东所写，而是一位爱好填词作诗的年轻的作品。这位年轻人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当作毛泽东的作品传抄时十分震惊，连忙出来澄清，反而被扣上“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大帽子，被关押、批斗。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社会上有两首毛泽东批评郭沫若“尊孔反法”的诗流传。它们被写在大字报上，但未见之于当时编印的毛泽东诗词集中。现已证实，其中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系毛泽东1973年的作品（传抄件有误字）。毛泽东传抄诗的流传，是“文革”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

如上所说，“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可避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那时，毛泽东诗词被某些人当成了搞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说、研究工作就总体而言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泥坑，远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时期，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集大量出版发行，使得毛泽东诗词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毛泽东诗词本身以其内在的高尚精神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评价那个年代的毛泽东诗词版本所起作用时，需要加以明确的。

~~~~~

## 【往事回首】

### 关于文革邮票的探讨

• 狄超英 •

文革邮票从开始发行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关于文革邮票的研究，从《集邮》杂志和有关的报刊也见到不少，我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翻阅了文革时期的报纸，看到了当时报纸上的历史记载，以及后来出版的有关历年的邮票目录，参考了国外相关的邮票目录，便产生了许多疑问，提出来供爱好者研究。

#### 一、邮票的票名

这个问题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毕竟是一个问题。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登载了文2邮票的发行报道：新华社三十日讯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发行“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纪念邮票一套，共八枚。文2邮票的票名应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而目录中只写成《毛主席万岁》。戈中博曾在《集邮》杂志“文票沧桑”栏目中也提到过此问题。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登载了文6和文7邮票的发行报道：新华社三十日讯邮电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决定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起陆续发行下列两大邮票：一、《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纪念邮票。二、《毛主席诗词》纪念邮票。文6邮票的票名是《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目录中只写成《毛主席与世界人民》，不知是什么原因。文革邮票中其它邮票票名都已做了更正，只有这两套邮票没有改正。另外，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的发行通知上写的票名是《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而目录上去掉了“油画”两字。对于邮票的票名，是否还是应该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为好。

## 二、邮票的发行时间

文2邮票是分两次发行的，第一次发行了五枚，是1967年5月1日发行的。第二次发行了三枚，目录中的发行时间是1967年9月，到底是哪一天发行的，目录中没有标出。我查看了外国邮票目录，美国斯科特目录是1967年9月20日，英国吉本斯目录也是1967年9月20日，在1996年秋季嘉德邮品拍卖目录上，有一枚中国集邮公司寄往丹麦的实寄封，日期是1967年9月23日，到底是哪一天？再有文2邮票第一次发行了五枚，是哪五枚？第二次发行了三枚，是哪三枚？邮票目录中是8-1、8-2、8-3、8-4、8-5第一次发行，8-6、8-7、8-8第二次发行。我认为是8-1、8-2、8-3、8-4、8-6第一次发行，8-5、8-7、8-8第二次发行。理由有四个：一、我在福尼特邮市见过8-6那枚邮票的全张盖销票，戳上日期是1967年5月1日，我问过有关人士，盖销票上盖销戳的日期只能是邮票发行后的日期，不可能提前。二、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登载了文2邮票的发行报道，有8-6那枚邮票图案，而没有8-5那枚邮票图案。三、1996年秋季嘉德邮品拍卖目录上有一枚中国集邮公司寄往丹麦的文2邮票实寄封，封上只贴有8-5、8-7、8-8三枚九月发行的邮票。四、我整理的文革信销票，恰好8-6那枚邮票的邮戳较为清晰，上面盖有1967·7·21浙江杭州6支邮戳。

文4《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邮票也是分两次发行的，目录上标出的是第一次发行了两枚，第二次发行了三枚，第一次发行的日期是1967年7月1日，第二次发行的日期是1967年9月18日，我认为是第一次只发行了8分那一枚，第二次发行了其余四枚，4分邮票是随着三枚高值邮票一起发行的。戈中博曾提到，文4邮票1967年7月1日先出售8分一种，其余邮票印出再出售。从1996年秋季嘉德邮品拍卖目录上有一枚中国集邮公司寄往丹麦的文4邮票实寄封上可以看出，封上贴有5-1、5-3、5-4、5-5四枚邮票，发行日期是1967年9月23日，虽然不是首发日期，但能够说明4分邮票是随三枚高值一起发行的。

文7《毛主席诗词》邮票分三次发行，第一次1967年10月1日，第二次1967年10月6日，第三次1968年5月1日。第一次只发行了三次：“毛主席在工作”；“毛主席诗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毛主席诗词《采桑子重阳》”。这没有疑义。第二次发行，中国出的目录上是两枚：“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毛主席诗词《清平乐会昌》”。而日本出的目录是三枚：“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主席诗词《清平乐会昌》”。到底是哪个对？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既不敢否认或赞同日本目录，也不敢否认或赞同中国目录，只好提出供大家来研究。

## 三、文3和文5邮票的一些问题

文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邮票共发行三枚，哪是第一枚，哪是第二枚，哪是第三枚，目录中没有明确标出，只有邮票图案的顺序。我查阅了1967年5



月24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登载了文3邮票的发行报道，第一图：摘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第二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第三图：摘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认为目录中邮票图案的顺序是错误的，不应该把第三图放在上面，而是3-1和3-3对调。

文5“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九枚邮票目录中的顺序是：9-1文艺队伍9-2京剧《智取威虎山》9-3京剧《海港》9-4京剧《红灯记》9-5京剧《沙家浜》9-6京剧《奇袭白虎团》9-7芭蕾舞《红色娘子军》9-8芭蕾舞《白毛女》9-9交响乐《沙家浜》。我查阅了196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登载了文5邮票的发行报道：邮票的顺序却不同，它们是：

- 第一图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 第二图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 第三图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 第四图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 第五图革命现代京剧《海港》
- 第六图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 第七图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 第八图芭蕾舞剧《白毛女》
- 第九图交响音乐《沙家浜》不知是什么原因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 四、邮票的发行量

我们都知道正式发行的文革邮票19套，最贵的一套邮票当数文10《毛主席最新指示》，市场价格是28500元—30000元，是什么原因这么贵？我们再看看发行量7500万套，也是发行量第二多的一套邮票（发行量最多的邮票是文15，一亿枚），怎么可能发行量大却最贵？戈中博曾在《集邮》杂志“文票沧桑”中提到，1968年7月20日发行的文10邮票的印量是1000万套。那么应只有5000万枚，整整差了7.5倍，不知是谁出了错误，到底发行量应是多少？

“文”字邮票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的历史产物，是在无序状态下发行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我们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为了在我们这一代把问题搞清楚，而不是让我们的子孙再去做历史考证。

□ 《集邮》1999.12

~~~~~

【各抒己见】

林案再思考

• W u r e n •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概没有比林案更大的冤案了，也没有比林案更富有戏剧性的定罪方法的展示了。同样一个故事，同样一个案件，其定罪的前后依据在老毛生前和死后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也没有人去质疑我们的司法系统的公正性，也算是一个中国特色。简单但不偏激地

讲，新中国的法律根本就是一些扭曲的文字，而法官们都是权力的傀儡，中国的审判和执法是没有象其宣称的那样“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待林案的。对林案的再思考，将林的前后倒台的人的案例联想一遍，谁都会在心里涌起真实的悲哀。林案，说来好沉重。即使是现在，很多当年的所谓证据被证伪的情况下，林案依旧是禁忌话题，不得不让人深思。可以做如此猜测，林案重新审视的日子，就是重评毛泽东这个暴君的一天，是中国历史真实记录的一个伟大尝试，当然也是中国民主化最重要的一步。

林彪之大起大落，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成为中国人私下讨论最多的话题。虽然人免不了一死，我还是同意网上的流行看法，林的倒台是必然的。当然，我不是宿命论者，认为文革中修林的故居时坏了风水。而且，我决不同意那些毛派分子的论调，污蔑林是掘墓自葬。我想说的是一点朴素的中国的传统哲学，盛极必衰，鸟尽弓藏。回头看看建国以来的大案件，几乎都是围绕围剿四野人马的，分化打击一直没有停过。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四野军半天下，林彪本人功高盖世，帐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老毛要弱枝强干，必从四野开刀。抗美援朝，四野受大损。然后卸磨杀驴，高岗是头一个受害者，接着就是陶铸，彭德怀的所谓党羽，大部也是四野人马。追着林家跑的匿名信，肯定也让林感觉到背后有杀手。老毛利用权术，收买、分化、瓦解和高压政策，将四野势力消于无形，最后终于将林送上断头台。关于林早期反毛事件，有一个有趣的党的公开说法。老毛总是怀疑彭唆使林写信要求毛放弃军事指挥权，而不怀疑林，理由是林为其爱将。而且，林也不公开解释，似乎林是有意栽赃彭。这样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没有历史依据。从现在公开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老毛并非不怀疑林，而是害怕失去林这样的常胜将军。老毛曾经公开向张国涛叫嚷：别想抢走我的林彪。另外，林彪之兄对老毛夺权起了关键性作用，当年老毛羽翼未满，焉敢放肆？建国后，形势大变，老毛不需要超强的太平将军，尤其能力比自己要强很多的人，林等的命运就是注定了。刘少奇在被打倒前，见不到毛，就见了林一面。他们间的真实谈话至今无法得知，但此事肯定为毛所知晓，也为林的倒台埋了伏笔。当年朱元璋问汪广洋是否知道所谓毒杀刘基事件，汪据实说不知，朱皇帝杀了汪。朱与毛是一个货色，无论知不知，只要他惦记着某一个人，该人就是死路一条。

林的罪行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是不一样的，虽然被判是同样的罪。在毛时代，林的罪行是勾结彭德怀反革命集团，高岗反革命集团，刘少奇反革命集团的同路人，五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老毛在毛家湾根本找不到所谓的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于是就虚拟所谓的国家主席之争。其实，事后看来，这个国家主席之争，就是赵高指鹿为马的翻版。设不设国家主席，道理是显而易见，争就争在谁能表示忠心，将鹿说成马。那些起先指鹿为鹿者，如汪东兴，许世友，陈毅等，在“毛主席教导下”改口为马，就天下太平。相反，坚持真理者就中了赵高的阴招了，如林等。批林的难度就由此可想而知，一是林的功劳大，无人能及，二是林没有什么可以实证的罪可以被批。于是，老毛看见林崇尚儒家文化，就指示江青和“妃子”谢静宜等，组织批林批孔的运动。可笑那个“三松堂”主人（还好他没敢玷污“三槐堂”名号），一辈子念儒家书籍，到头来也跟着辱没圣人，也算走狗风范。现在所谓的批林批孔是冲周恩来去的，多半是臆测，这个运动的实用性和目的性都是紧随林的，只要你能想一想在军队里多少人根本不愿意批林。批周只是后话，是老毛开批《水浒传》宋江的投降主义，顺手攻击周，拿下毛家子弟兵夺权的最后一个大障碍。

后毛时代，邓小平等的林案，主要集中精力在所谓林与五人帮的勾结上，丑化林为五人帮的同伙。然而，事实上，林是最坚决的五人帮的反对者，庐山会议就是大规模的反对五人帮运动。如果说林跟五人帮勾结，那么，所有的顺从五人帮的人，在鞍前马后拍老毛、江青等马屁的人，如邓小平，周恩来等，都与五人帮勾结，而且勾结的程度比林深得多，时间比林长得多。邓小平丑化林的另一手法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封锁所谓“好人”干的坏事，突出所谓“坏人”干的坏事，将林在文革中的错误言行放大，单独拿出来示众。但是，对于与林同等地位的人的言行，则根本不敢暴露出来，如周的所作所为。举例来讲，林的庐山批彭，毛派分子放大

林骂人的影响，而忽略那些实证彭里通外国的人。事实上，正是这些冤案制造专家们的杰作，才使彭下狱。林也曾在会议上骂过江青，而且不一般的狠，但江青就没有事情，可见骂人的作用是多么有限。林的罪难找，只有栽赃一个办法。所以很多官方语言是经不起推敲的。举例来讲，那些大跃进饿死农民的事情，本来与林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某些人居然也往林身上扯。按照官方的说法，饿死人还是与所谓的苏修逼债有关，而我国欠苏联的债则来自于抗美援朝，林是坚决反对卷入韩战的人。所以，按照逻辑，林的先见之明应该受到大力歌颂，起码与彭的“我为人民鼓与呼”有一比。很可惜，我国是一个“曲突徙薪无人问，焦头烂额为上客”的民族，没有人为林之高见喝彩。

林案已经过去三十年，官方和民间看法是水火不相容。因此，官方要维持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义，专案专家们必须维持两个基本概念之争。一个是所谓林支持设国家主席，想抢班夺权，另一个是所谓政变。从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窘迫来看，由林彪支持，老毛反对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争，已经陷于了悖论之中。如果陈的报告是支持发展生产力，即所谓老毛批判的“唯生产力论”，事实已经证明林支持陈是对的，老毛是错的，这样的证据则可以证明林的冤屈。这一点，从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揭露出林的所谓罪行中得到证实，林支持发展生产力，要结束文革。退一步说，即使陈的报告支持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当时定罪就是老毛冤屈了林，也是一个冤案。基于这一点，共产党现在根本不敢公开陈的报告内容，虽然这是一个死报告。进一步说，林要反毛，必须有矛盾，矛盾从何而来呢？这就是为什么五人帮的残渣余孽坚持说林要求设国家主席是出发点不好（所谓提建议是夺权）。有意思的是，那个基本上是唯一证明林说要逃到苏联而立了大功的人——李文普，却证明说林根本不想当什么国家主席。所以，指责林要抢班夺权，纯属诬陷。那么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再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国家主席之争，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赵高“指鹿为马”把戏的翻版。指鹿为马，看似愚蠢，其实是最好的检测忠心程度的方法。马和鹿，都是常见动物，没有人（排除弱智）不知道他们的区别。所以，跟着说马的人，肯定是一切以领袖的意志为转移，而不在乎什么真理了，这样的人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相反，那些坚持真理说鹿的人，肯定在关键时候不会为主子说话，而是向着所谓的正义。而正义，老毛是不需要的，这对皇权没有什么好处。更为严重的是，当林提出批张春桥时，应者如云，老毛担心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再设想一下，如果林提出打张等后来被命名为四人帮的几个人时，没有人附和，反而有很多人反对，恐怕林后来命运就不一样，很可能会善终。设国家主席对不对该不该，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这场争执中，林也是对的。为什么五人帮的余孽要坚持说林不对呢？没有这一点，林和毛就没有堂而皇之的矛盾，不能证明林的野心，也就没有办法证明林想谋反；不谋反，哪里会来什么谋杀和叛逃呢？没有谋杀和叛逃，哪里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呢？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国家主席之争是“欲加之罪”，那么，专案专家们丝丝入扣的逻辑就有问题，断了所需要的一环。细心的读者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结论，林案是不清不白的，证据不能成为证据，理由不能成为理由。我再提醒一下，那个所谓政变军事预演——一号令，已经被证明是伪证。我们还能猜测什么呢？我个人完全赞同金兑先生的论述，对于林案，没有独立调查机构的详细调查，证据和结论都是不可信的。

林案明显有这么多荒谬之处，坦白地讲，我个人也对林是否真的在那架飞机上存疑。但林豆豆也相信，我也只好说在上面。退一步分析，就所谓的铁证叛逃来讲，林在飞机上根本就没有带什么机密文件，共产党自己说只有红宝书和林立果出入空军学院的证件，就足以说明不能跟到大连度假区别开。想想看，如果飞行定位仪器被破坏成只能指向某一方向，黑暗中飞机能飞往哪里？整彭德怀时，彭就被人污蔑要逃跑到苏联，没有料到整林时还是此诡计。看样子，苏联太近，专案专家们认为好跑一点吧。没有带机密文件，即使共产党解释成仓促逃跑的缘故，但林是很细致认真的人，军用地图应该是必备的。更为荒谬的是，如果林仓惶得连基本的东西，如几份军事材料都来不及带走，那些搞政变的军事谋反计划，谋反人员组织机构材料肯定在毛

家湾、北戴河丢得满地都是。很可惜，掘地三尺，专案组也没有找到。这样的军事政变有什么好证实的？如果是证伪，则是恰如其份了。进一步说，如果571是一个军事政变计划，那么就是对林军事才能的污蔑，就是老毛真实的“军事天才”的写照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林案的判决呢？

为什么老毛如此倒行逆施呢？有的人说老毛晚年有精神病，再加上所谓“四人帮”的蒙蔽。其实，老毛跟江青关系是很好的，举例来讲，别的人受老毛批评，就是钦犯，万劫不复，而江青受老毛几次批评，地位反而越来越高。所以，有外国记者问邓关于“五人帮”的名词，邓顾左右而言他。我觉得还是金兑先生分析有道理，老毛就是想做皇帝。这样看来，所有老毛的反常举动都有了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忠心如此重要的原因。喊万岁，语录歌，忠字舞，毛像章，跟魏忠贤（九千岁）做法惊人类似。刘邦唆使吕后杀韩信，恐怕也是基于“非刘氏不得为王”的缘故。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纠左，但是后来发展到左得不能再左。这里面的原因决不是什么老毛一时糊涂，或者彭德怀脾气太大犯了众怒。根本原因就是老毛发现彭的信里的不满，其内涵是坚持真理，而不是坚持忠心，所以老毛要老帐新帐一起算。看看文革夺权后的结果，皇亲，宦官和内侍横行。文革小组基本是江青主导一切，高参是康生，李讷、毛远新权倾一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谁能使用老毛的四大秘书？据说，陈伯达想给朱德写回忆录，都被老毛粗暴制止。所以，文革小组的幕后人就是老毛。一个明显的夺权招术就是，国务院的权力渐渐转移到文革小组，周成了名副其实的奴才。文革小组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军权，可惜受阻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老毛已经看出了林的不忠，林也就向黄泉路上开始加速了。老毛心里很明白，受骗的只是那些平头百姓罢了。

一个林案，当局捂得越紧，越说明里面有文章；愈是不敢公开讨论，愈是说明有见不得阳光的内容；越是含糊，越是吸引人来研究。但愿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来揭露黑暗，让阳光能够照射在中国的大地上，让冤死者瞑目，让暴君回到桀纣的行列里，让中国的历史不再成为谎言的代名词，诸君期勉之！

~~~~~

## 【知情者说】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 叶永烈 •

### ◇ 缘起

2001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谈话自然是从谈那个动乱岁月开始的，但是也谈了他的经历：

胡克实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武昌，毕业于湖北省立高中部。学生时代他在武汉，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1938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任晋西北根据地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四分区青联主席等职，可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从青年工作

开始的。

1948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1952年，31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1953年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文革”开始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冒出了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驱使，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

胡克实还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的大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 ◇ 亲历“文革”初期的激烈斗争

一提起这段往事，胡克实便沉浸于“文革”岁月的回忆之中。

胡克实说，在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毛泽东主席那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不过，就连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更不知道他俩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打倒对象。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定了4个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整理成文字，向毛泽东报告。

在1966年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会议。事先报告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胡耀邦在西北工作并不顺心。胡耀邦生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既然人家不欢迎你，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生病，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记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很乱，特别是学校里，出现学生打老师、打校长。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没有精神准备。他们用过去的办法，即由上级部门派驻工作组。会议决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另外，还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上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北京市西城区中学的工作组，就由胡启立负总责。

胡克实说，没想到，工作组问题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打人。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发现之后，及时地加以制止。6月20日，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肯定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批转全国执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却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发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消这个文件。”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各地掀起了反对、批判、揪斗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么一来，毛刘分歧由隐蔽到完全公开。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胡克实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他亲眼目睹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怎样决定派工作组的，又亲耳听到刘少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检讨。他说，过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威望和才华，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确。胡克实笑称“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 ◇ 胡耀邦的“牛棚”岁月

胡克实说起了“文革”初期的团中央。胡克实说，那时候团中央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团中央直接面对青年，也派出那么多的工作组，不言而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很感叹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被煽动起来，处于狂热状态，真的有点像宗教的狂热、民族的狂热！大学生还好一点，毕竟年纪大一点，懂得一点“规矩”，最没有办法的是中学生。他称中学生“没有章法”，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然而，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主管，理所当然受到成千上万无知的中学生们的狂热冲击。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让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章，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中央，“三胡”停职反省。

胡克实记得，李富春作为中央代表，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三胡”停职反省。李富春说，“三胡”停职反省，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是：

-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
- 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

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

这“三个不够”，就导致“三胡”停职反省。后来，李富春本人也因为这“三个不够”，遭到同样命运。

这时，胡耀邦不能不从医院出来，回到共青团中央进行“反省”。

由于“三胡”停职反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

在停职反省之初，“三胡”还能回家。到了后来，就只能整天呆在团中央机关里写检讨，不能回家了。

没多久，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又被取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李富春找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三胡”保护好，绝对不能出事；还要保护好“三胡”的家，不能让人冲击。

当时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还不错，非常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李富春的指示。这个负责人原本是上海工厂的团委书记。1964年，曾经挑选一批基层团委书记到中央部门工作，这人到了轻工业部工作。他很沉着，也很老练，后来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根据李富春的指示，他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大楼派了解放军岗哨。这样，没有得到批准，红卫兵是不允许进入机关大楼，也就保证了“三胡”的人身安全。只有经过批准，岗哨才放行，进来三两个红卫兵，找他们外调，或者问话之类。

胡克实记得，那时共青团中央的院子里，常常挤满了狂热的红卫兵，召开批判“三胡”的大会，坚决要求把“三胡”拉出来示众。这时，“三胡”也只是在机关大楼的阳台上“亮相”而已。红卫兵们只能用双眼“看”着“三胡”，手够不着，自然也就无法“武斗”。

这时，外边越来越乱，抄家、武斗成风。经常有人要求把“三胡”拉出去批斗。

最严峻的时刻终于到来。那是1966年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师，却被说成是工作组“挑唆”，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红卫兵大会，追悼那个死去的教师，并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大会结束之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这是红卫兵对共青团发动的一次最强大的“攻势”。

团中央派驻了军代表。军代表强调，胡耀邦有病，不能拉出去批斗。你们实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实、胡启立以及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那六七个人，不能拉胡耀邦。即使是拉胡克实他们出去，也必须文斗，不许武斗。

胡克实说，他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在那样混乱的状态下，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可能只是“文斗”。他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害。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大约被拉出去斗了十几次。他和胡启立挨斗，那就更多。

当时，他们在团中央被关在“牛棚”里。他们属于“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们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时候的“牛棚”，就是团中央机关的大房间。他们睡在地上，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个“牛鬼蛇神”。“三胡”被分开来，关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不过，“牛棚”挨在一起，出去解手或者接受外调时，彼此都还能看见。

1968年10月的一天，忽然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把胡耀邦找走了。起初以为是外调。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回来了，把牙刷、毛巾、换洗衣服、被子都带走了，

当时的“牛棚”看守，大都是团中央原先的司机、勤杂工等，常常给“牛鬼蛇神”报告消息。“胡耀邦被带走”，这当然是“重大新闻”。通过看守们的嘴巴“广播”，这一“重大新闻”立即传遍各个“牛棚”。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牛鬼蛇神”的心。“牛鬼蛇神”们议论纷纷，猜测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让胡耀邦回家还是进监狱关起来？

胡耀邦这一走，竟然从此离开了团中央的“牛棚”。来自看守们的“小广播”是乐观的，他们告诉“牛鬼蛇神”们，胡耀邦是去中央开会！

这就是说，胡耀邦“解放”了！看守们说，既然胡耀邦“解放”了，你们也快“解放”了。

后来才知道，胡耀邦出了团中央的“牛棚”，竟然被径直送进了京西宾馆！

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要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关于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然而，由于在“文革”中许多中共中央委员遭受迫害，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可能不足半数，无法通过这些所谓的决议。为了凑数，就从原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之中，寻找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以求能够过半数。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员，属于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于是把他从“牛棚”中突然接到会议代表住宿处——京西宾馆。

会议之后，周恩来把胡耀邦等一批刚出“牛棚”的中共中央委员趁机保护起来，让他们留在京西宾馆。这是因为京西宾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重要宾馆，红卫兵、造反派们很难冲进来。胡耀邦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住了两三个月。

#### ◇ 毛泽东否定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在“文革”中，共青团中央曾经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通知，要求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前往全国各地。

工作组不是挨了批判，派工作组不是被说成是“路线错误”，怎么又要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呢？

原来，这工作组是专门去“征求意见”。“征求”什么“意见”呢？据说，共青团已经“修”（指修正主义）到家了，已经沦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爪牙”，必须彻底改组或者干脆取消共青团。由共青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就是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如何改组或者取消共青团。当时，江青也参加了意见，他们打算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当时，全国各省市都在纷纷召开“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红代会”，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中央组织。陈伯达和江青以为，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以红卫兵



取代共青团是“历史的必然”。

就在共青团中央奉命组织工作组、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许多工作组正准备出发，突然又接到通知，说是取消了计划，不派工作组了。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毛泽东不赞成！

后来才明白，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毕竟是大事，陈伯达、江青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不以为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共青团，我要共青团。”毛泽东还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一言九鼎。陈伯达、江青打消了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念头，所以也就急急忙忙取消了向各地派遣工作组的计划。

◇ 他成了“走资派好人”

在1968年10月胡耀邦出了“牛棚”之后，胡克实他们在“牛棚”里也开始松动，比过去自由、自在多了。看守们也向他们透露消息：“你们没事了，快出‘牛棚’了。快了，快了！”

这时，军代表找胡克实谈话。军代表说，你的历史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你在团中央也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那是“路线问题”，谁都知道的。军代表的话，显然是“解放”胡克实的讯号。

果真，当1969年元旦来临的时候，胡克实就得到通知，可以回家了！从此，他结束了“牛棚”生活。

1969年1月，军代表要胡克实在团中央作个检查，“往深里挖一下”，就可以放他过关。在胡克实写好检查之后，团中央机关在礼堂里开会，胡克实照着念了一遍，从此也就算是过关了，结束了停职反省。

在“解放”之后，没有宣布胡克实恢复团中央书记职务，但是也没有宣布取消他原先的团中央书记的职务，而是让他参加团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算是“结合”了的“革命干部”。

胡克实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听说要保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他的孩子需要团中央开一份关于他的政治情况的证明。胡克实记得，军代表在证明上写着，胡克实“属于走资派好人”！

这“走资派好人”，实际上是当时对胡克实作的政治结论。对于今日青年读者来说，这“走资派好人”颇为费解。其实，那“走资派”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好人”！

◇ 胡耀邦在家“赋闲”的日子

胡克实谈起了胡耀邦。

他跟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共事14年，而且从1955年至1978年做了23年邻居。

他说，那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书们，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

在“解放”之后，胡克实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去了。

直到1971年底，胡耀邦因病终于获准从河南回到北京。一个月后，胡克实也回到北京。胡克实拿出一帧珍贵的照片，送给笔者。这张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1972年初的合影，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们都穿着中式旧棉袄，表情木然，是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写照。

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分配他们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很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音讯。

从此，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他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在家读了大量的书。胡耀邦家几大书柜里的藏书，画着他的阅读记号，表明他读书非常认真。这些书，很多是在他“赋闲”时细读的。

1973年10月，胡克实调任中央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

国家地震局本来是一个工作并不很忙的单位，但是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处于日夜工作状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召开紧急会议，胡克实作为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一见面，华国锋对他格外热情。那是因为当年胡克实在晋西北工作时，先后担任临县、离石县、方山县的县委书记，属于“三地委”，而华国锋则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属于“八地委”，彼此早就认识……胡克实说，华国锋是个谦厚的人。毛泽东在晚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约是出于要选择一个没有二心的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了几年，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1973年3月10日，传来好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5年5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四十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王洪文，实际上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以与“四人帮”抗衡。

◇ “人品高尚，襟怀坦白”的胡耀邦

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说：“该结个业吧！”于是，1975年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

在中央读书班上，胡耀邦见到在读书班另一个班学习的苏振华，特别高兴。当年在陕北“抗大”，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政委，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他们多年未见，在结业典礼上相见，互相拥抱，兴高采烈。许多老同志见到胡耀邦，也都跟他握手、问候。

叶剑英、邓小平、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没有看见胡耀邦？”

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里！”

当年，叶剑英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已经叫惯他“参座”。

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

叶帅其实话里有话。

叶帅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谊。叶帅好几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时，就在胡耀邦家吃饭。胡耀邦就到后院叫胡克实一起来吃饭，跟叶帅见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跟邓小平见了面。邓小平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胡耀邦早在长征时期就已经认识邓小平。在延安时期有过许多来往。1950年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川北行署首长，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同时调往北京。此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在报道打倒邓小平与胡耀邦时，曾经刊登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许多通信，这表明邓小平与胡耀邦在当时就存在很密切的关系。

胡克实记起，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党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形势，健全团的工作，学会作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会议期间，胡耀邦邀请邓小平前来作报告。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邓小平谈到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以为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关系一层又一层，并不有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够发展农村生产，各种生产形式都可以。他说起他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是赞成包产到户。邓小平是在上午讲这番话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诉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不要往下传达。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

正是因为邓小平与胡耀邦有过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读书班结业典礼上见到胡耀邦，邓小平得知胡耀邦正“赋闲”在家，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说：“你这个

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就在比赛进行之际，有人跑来告诉胡耀邦，说是邓小平来电话找他。胡耀邦匆匆来到后台，用红机子跟邓小平通话。

胡耀邦赶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院长是郭沫若，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就这样，胡耀邦开始了重新工作。略早于胡耀邦，在1975年1月，胡克实也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于是，这两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又在中国科学院并肩工作。

胡克实说，邓小平有着锐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邓小平平日话不多，要言不烦，从不拖泥带水，讲话很深刻。

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文革”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1975年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谈了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胡耀邦进行修改，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认为，这一《汇报提纲》适用于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顿工作，送交毛泽东，准备印发全国。但是毛泽东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四人帮”的“批判”，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指斥为“大毒草”。胡耀邦随着邓小平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又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从富强胡同迁出的。当时，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应该住进中南海。胡耀邦不愿住中南海，认为住在那里朋友们来访诸多不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那房子在中南海之外，紧挨着中南海的红墙。他请人开了扇后门，直通中南海，便于在中央工作。然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们来访，可以从外面的大门直接进入，不必经过中南海。直到今日，胡耀邦的家属还住在那里，只是关闭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门。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不整人。

胡耀邦早在中央苏区，小小年纪，就蒙受过所谓“AB团”的冤案。从那时候起，十几岁的胡耀邦就亲身体验到被整之苦，冤案之苦。从此，他非常厌恶、痛恨整人。他总是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必须非常小心。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给予鼓励，曾经使刘绍棠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

也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曾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出了大力。

胡克实说，胡耀邦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跟青年心连心。胡耀邦的性格也很年轻。他直率，真诚，乐观，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胡耀邦除了一些重大场合讲话拿发言稿之外，平常即席讲话，从不拿稿子。而且非常具有鼓动性，热情洋溢，富有文采。

◇ 八十大寿出版新著

就在我采访胡克实的时候，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大摞新书。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印出的胡克实所著《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这本书收入胡克实多年以来所写的关于科技工作、科技立法方面的讲话、论文。

据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丕光告诉笔者，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两个月内赶出的新书，为的是作为献给胡克实八十大寿的一件特殊而又最有意义的礼物。

胡克实作为团中央书记，怎么会写起《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呢？

那是因为胡克实自从离开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岗位之后，一直从事科技领导工作。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之后，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胡克实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后，在1988年再度当选。他负责科技立法、执法检查等科技法制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代表科学院和全国人大出访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瑞士、美国、意大利等国二十余次，借鉴了许多有益经验。

胡克实的夫人于今也是延安老干部。如今，他们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忙于工作，夫妇俩在北京安度晚年。胡克实在三年前曾经有过小中风，而且气喘老毛病也一直纠缠着他，但是他的精神很好。

胡克实曾是中共第八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中央人大政协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副主席，中国桥牌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名誉会长。

□ 《炎黄春秋》2005. 8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